

身体：以军营新兵训练为例

——兼就若干身体理论问题与郑震先生商榷

江 中

20世纪末,西方社会学界在经历了语言学、解释学、修辞学等一系列转向之后又开始了“身体学转向”。“即把身体问题化,成为社会理论的组成要素,同时也认识到身体是当代政治和文化中的一项重大话题”(特纳,2003:578)。这种理论转向的深层现实背景是对消费、休闲、时尚以及大众文化的关注,并且身体在从生产向消费、从劳动向休闲、从精英向大众、从传统向时尚的视点转移中,也承载着自身的转变。国内学者近年也开始注意到社会理论的“身体学转向”问题,但纯粹在社会学理论视域中就身体论本身进行分析的尚不多见,《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刊登了郑震先生的论文《论身体》(以下简称“郑文”)显然敏感地抓住了这一问题,并开启了人们的思考。但在我看来,郑震先生的研究在若干问题上仍显模糊不清,笔者想接着郑震先生的话题,以军营新兵训练为例,探究身体社会学的相关论题,并在此过程中兼就一些身体理论问题与郑震先生商榷,希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问题的提出与主要概念

从西点军校到中国军营,使所有参加过严格新兵训练(一般简称“新训”)的军人永生铭记的便是强化训练带给人“身体”上的锤炼。西点军校新训的军营被称为“兽营”,而由我军总参大学生新训基地流传向全军的一句新训名言是:“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毫无疑问,身体上的强化训练是新训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不但帮助那些刚刚进入军队的平民能够初步达到从军这一特殊职业在身体上的需要,而且可以实现对平民的军事化规约,使他们初步完成从平民认知角色向军人认知角色的转变。

从物理上说,身体在军营新训中承受的极端条件不亚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关于监狱的著名论述。不同的是,在军队的新训中,绝大多数“准军人”都努力适应这种“规训”,并且以其作为今后成功的必经阶梯或磨练自己的“试金石”,作为一种平民体会不到的“奖赏”和自己未来的财富来体验、承受和珍存。与此相反,福柯所描绘的那种情况则是缘于一种受惩罚的“理由”,“人们就经常听到这种与严格的刑法理论相反的却与惩罚的作用相一致的说法,即坐牢的人是在‘还债’”(福柯,1999a:261)。因而,虽然从物理效果上说,“规训”的力量相差无多,但后者对人造成的痛苦程度与威慑程度都远大于前者,甚至不可同日而语。遗憾的是,福柯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差别(这与后面将提到的他对“身体”的理解有密切关系),他坚定地认为:“监狱很像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兵营、一所严格的学校、一个阴暗的工厂。监狱与它们没有实质上的差别”(福柯,1999a:261)。于是,将军营的新兵训练作为典型现象被纳入理论研究视域,而分析造成福柯这种忽视的缘由,就成为本文关注的问题。

在考察这一问题的入口处,必须澄清对“身体”概念的一般性理解。郑文曾在文章开端对“身体”做了一个简短的、在笔者看来不甚明确的“定义”:“身体就是在生活世界之中并在前意识的指导下实践着的行动者”。这里,作者是在用精神分析的概念进行定义,但在后面的论述中,却未说明为什么将身体定义为“前意识的”,后面的论述似乎与此无关。笔者发现郑文中的“身体”一词完全可以替换为“行动者”一词而无损于对文章的理解(甚至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时间性与空间性”中,“身体”也完全可以换成时间与空间中的任何之物),作者似乎只是在进行一种行动哲学的论述,“身体”已不晓得被置于何处,文中充满晦涩拗口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翻译”话语,令人不知所云。这里并不是说不应该用现象学或存在

主义等进行解释,恰恰相反,众所周知,正是莫里斯·梅洛-庞蒂早于福柯在《知觉现象学》中用相当多的篇幅论述了“身体”,任何身体社会学的论述都不可忽视这一点(郑文虽然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了《知觉现象学》,但笔者似乎并未能找到梅洛-庞蒂的影子,却几乎处处遭遇到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身影)。笔者在这里只是想说明,郑文的主题虽然名为“论身体”,但其实真正论述的并不是“身体”,而是“行动者”,郑文的参考引注中所援引的思想资源全部如下:胡塞尔3篇次,海德格尔2篇次,吉登斯4篇次,布迪厄8篇次,福柯3篇次。由此不难分析出,实际上除福柯(也不过是未加分析地使用)和可勉强包括在内的吉登斯、布迪厄的些许思想之外,郑文的思想资源中并无任何身体社会学的论述,与此相应,他在文中也未给出多少对“身体”理论的直接阐发,只是让人感受到一种与“身体”距离过于遥远的“宏大叙述”。伊格尔顿在评价身体学转向为何兴起时曾指出,“作为一种绝对细部的现象,身体很符合对堂皇叙事感到头疼的后现代主义的口味,也很适合美国实用主义对具体之物的爱恋”(伊格尔顿,1999:200)。郑文丢失的恰恰是这种“身体”的“具体性”。下面,笔者将对“身体”概念做一具体分析。

首先,这里使用的“身体”概念绝不仅仅意味着“躯体”、“肉体”或“机体”等通常的含义,许多身体社会学家已经揭示这种混淆是笛卡尔“身体/灵魂”的二分认知模式传统所造成的后遗症(斯特拉桑,1999:3;伊格尔顿,1999:201),这种混淆被布迪厄指认为“误识”(misrecognition),即一种“符号暴力”被人们错误地认同并影响了人们后来的行动(布迪厄、华康德,1998:221—222)。笛卡尔的误识显然不幸也遗传给了福柯。在福柯的医学社会学、医学人类学研究中,虽然他深刻地看到了造成这种身体的机制及其后果是社会性的——这也是他相关著作中最吸引人之处,但不能掩盖的事实是,作为福柯视域中心的“身体”主要是生理意义上的“肉体”。在福柯那里,“身体”与“肉体”并无甚区别。令人欣慰的是,福柯延续笛卡尔的误识所形成的“符号暴力”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有意无意地进行着纠正。

其次,接着上述问题,由于身体不是躯体,因此,也不像郑文所界定的那样,可以被简单地指认为“前意识的行动者”。实际上,这一指认从根本上未能摆脱笛卡尔以来形成的二分式的现代性分析框架,这种框架认为,“身体与思维是分离的,这个观念四百年以来一直影响着现代思想”(斯普瑞特奈克,2001:17)。身体与行动、结构的关系是矛盾而复杂的,它既是行动的开端,又是行动的结果;既受结构的规约,又是建构的主体。用身体社会学来说,它是一种“体现”(embodiment)。

第三,那么,身体作为一种“体现”,其研究的起点与其追溯到福柯的“躯体”,毋宁追溯到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存在”。具体来说,躯体只是身体的物理基础层面,而身体是能动者体现出来的存在。梅洛-庞蒂早在《知觉现象学》中就向人们表明了这一点:“不能把机体归结为个人存在本身,也不能把个人存在归结为机体”(梅洛-庞蒂,2001:119)。福柯的问题恰在于此,伊格尔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梅洛-庞蒂到福柯的变迁也就是从关系的身体转到了客体的身体”(伊格尔顿,1999:201)。福柯与梅洛-庞蒂的这种差异类似于弗洛伊德与弗兰克尔(Viktor E. Frankl)的分歧,明晰这种分歧将更有助于澄清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弗兰克尔用自己三年囚禁于四所纳粹集中营的亲身经历指明:“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曾经断言,‘试让一些截然不同的人同样面临饥饿。随着饥饿的强制性刺激增强,一切个人差异都将渐趋模糊,代之而起的,将是所有人都表现出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谢天谢地,弗洛伊德不必身临其境了解集中营。他的患者可以高卧在维多利亚式的奢华睡椅上,而不必倒在奥斯威辛的污秽中。在那里,‘个人差异’并没有‘渐趋模糊’,而是相反,人们的差异越发明显;无赖或圣人,各显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弗兰克尔,1994:119—120)也就是说,身体即便在极其恶劣的物质环境中也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肉体,“人是根本上自决的。人并非仅仅活着,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决定他将怎样活着,下一刻他将怎样做”(弗兰克尔,1994:102)。很显然,如果说躯体(或肉体)还能与精神(或观念)在分析上区别开的话,那么“身体”则是与意义、观念分不开的,也绝不是能够脱离“能动性”的“前意识”行动,后期维特根斯坦用诗意的语言道出,“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图画”(维特根斯坦,1996:272)。

第四,当然,身体既不能被视为没有精神的肉体,也不是完全受精神控制的肉体,否则又会走入另一个极端。身体是身与心的统一,灵与肉的契合。正如生态学后现代主义的代表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所批评的:“由于现代世界观如此抽象,它支持心灵对身体的‘强制’计划……因此我特别强调具体。所谓‘身体’,我指的是统一的身心”(斯普瑞特奈克,2001:4-5)。身体,作为人类精神与物质的精致合一,作为个体与人类社会历史交互作用的产物,它与周围的环境既相矛盾又相协调,它是行动的外显又是行动的内化,它以时空为依据但又超越时空,它以私密为取向但又兼容公域。

本研究主要采用个案访谈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访谈采用无结构访谈,对象全部通过朋友、同学介绍引见,提供的信息比较真实可靠。为尽量保证访谈结论的典型性,访谈对象有男性、有女性,所在单位涉及我军的总部、各大军区及军兵种部队。除个案访谈以外,本研究还采用了《解放军报》、总参大学生军训基地主办的《黄龙金秋》等文献资料。

二、身体与环境

身体与环境经常处于矛盾状态,尤其在一种陌生环境中,身体所习惯的种种常识,或用吉登斯的话来讲,“共有知识”,都不同程度地失去解释力,为了了解一个异域文化(alien culture),就必须使行动者的身体“沉浸”于这种生活形式中,“去了解不同的生活形式就是了解如何找到能够作为实践总体的一部分而参与其中的方法”(Giddens, 1993: 169-170)。这是通常意义上环境(或结构)对身体的限制,然而,更重要的是,“不能简单地认为结构是对人类能动性的限制,它实际上也是对人类能动性的促进”(Giddens, 1993: 169)。这是吉登斯所说的“结构二重性”的第二个方面,即结构是如何激发了身体的能动性并经由后者所构成。这也是在此要考虑的,即身体是如何与环境相协调,并最终构成了环境。如果说,吉登斯主要考虑的是身体中的行动要素如何经由意义、规范和权力的互动而结构化的话(Giddens, 1993: 129-132),那么斯普瑞特奈克则更多关注身体中所表现出的统一的能动结构对周围环境的反应与协调。她发现:“由于现代的发展,渊源于人类境遇的传统关怀大多都被征服、控制和取代了:现代生活允诺人们可以脱离变幻莫测的身体、脱离自然的限制以及脱离对地方的乡土联系……诸如,对生命的机械论理解产生了把身体当作简单的因果原理控制的生物机器的观点,现代医学就适应了这一模式,它把任何有关人体对疾病的创造性和修复性反应的复杂机能现象都当作异常予以排除”(斯普瑞特奈克,2001:2-3)。梅洛-庞蒂则从现象学的角度指出了身体是占有世界的普遍方式,这种占有可以使世界有灵性,并从内部形成与其对应的世界统一体。正是这种统一保持了作为现象的身体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人也才能够感知和认识物、自然界和作为文化客体的他人的行为,“我的机体不是作为一种惰性的东西,它也进行存在的运动”(梅洛-庞蒂,2001:119)。

个案:“永远的金色”(吴广晶等,2002)

日复一日地叠被子、站军姿、踢正步……集训的生活枯燥有余活泼不足。训练时,腿迅速地又笔直地踢出,一根线横过脚尖。汗水、泪水一滴滴地流下,腿不停地颤抖,但只要教官不喊停,任何人的脚尖都不敢从线上掉下。沉甸甸的步枪一挂上,我立马被压矮了两厘米。每天就这样踢啊踢,踢得皮鞋从36码撑到了38码,踢得鞋跟经常掉经常补。理论学习课上,脑袋被塞得满满的。有时,我呆呆地望着天,心中充满疑惑:怎么一到训练时就艳阳高照,一到休息时就大雨滂沱呢?看着看着,我发现黄龙的天是灰的,地是灰的,花是灰的,草是灰的,我的心情也是灰蒙蒙的。终于有一天,我再也无法忍受这寂寞的生活,突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让泪水痛痛快快地流淌。

生活还是那么单调,日子却变得不那么难熬了。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我开始寻找集训生活的乐趣。有次训练间隙,我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突然看到开水房的门开着,我们4个女生跑进去,依偎在一起,那感觉就像进了总统套房。不知什么原因,我对枪有了特殊的感情,对射击有特别的兴趣。在射击训练中,我一动不动地趴在砂石地上,胳膊、膝盖都磨出了血印。射击考核时,我的成绩最好,看到战友们羡慕的目光,我开心极了。我还喜欢上了军事地形学,在中队惟一一位男性军训参谋的带领下,我们快乐地在晋中金色的大山里穿行,快

乐地寻找每个点位。一天10多公里路走下来,我对自己说:“我是好样的!”

阅兵那天,在绿色方队里,我手持步枪,踢着标准的正步,自豪地接受检阅。一个同伴的鞋踢掉了,但她还是赤着脚坚持踢下来。当“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时,每个人的心中都被浓浓的绿色充盈着……

虽然准军人在新训时的这种转变和主动适应很难,但绝大多数人都度过了这段时期。这种对环境的适应与行动的惯性有关系,行动并不是每时每刻都经过身体严格的理性化思考过程,“行动的‘理性化’过程并非时刻明确地诉诸行动者的反思监控意识”(刘江涛、田佑中,2003),有时,这依赖于一种“行动流”的惯性绵延,“灵魂和身体的结合每时每刻在存在的运动中实现”(梅洛-庞蒂,2001:125)。通过身体这种“习惯性”的行动流,身体的行动由开始时有意识地学习和训练,逐渐变为无意识的身体习惯。

个案:我们入伍后在陆军学院整整训练了一年,我们学的是步兵指挥专业,是按生长干部^①学员队的管理方法培训一年,非常正规,军校4年学的军事学科我们一年全学完,所有军事科目全训,那时真感觉能多活一天就多赚一天,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过来的。也有人吃不消的,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地方入伍大学生干部一共组成两个队,一个队是按干部轮训队的管理方式进行,一个就是像我们这样按生长干部学员队的管理方式进行,我们比那个队严格多了。在那个队就有两个人心理压力太大,受不了走了,但我们队却没有走的,后来想起来,可能是因为我们队管理严格,反倒是好事,一是那时只要能适应,到部队后都能适应,到部队后都是干部,再也不会苦过陆院新兵训练那会儿;二是太严格了,大家只能惯性地跟着,而轮训队的管理方式则自由一点,容易让人脑子开小差,琢磨事儿,所以你会发现,反倒是轮训队的人受不了走的人多……

正如前面提到的,行动流具有一定的惯性,“当人在‘行动’时,他就会沉浸于绵延的时间流中,而只有当他意识到这种时间流并对这种绵延进行回溯,也就是说诉诸反思时,行动流才被概念化为离散的部分和碎片”(刘江涛、田佑中,2003)。它在初始时可能有一种动机激发和意义认定的过程,但这种认定一旦完成,就会在身体中留下“印痕”,产生一定的延续性,人不可能时时刻刻诉诸反思,意识也不可能时时刻刻监控身体,于是身体在多数情况下依赖于一种行动流的惯性,只有遇到能够再次激发动机的“事件”或打断行动流的“时空隔断”时,这种身体的认知本能才会再次凸显出来。

三、身体与认知

斯普瑞特奈克曾经以后现代的视角宣称:“今天,对某些最具毁灭性的‘进步’所发出的匡正性挑战正来自完全料想不到的方面,那就是在现时代受到边缘化的领域,即认知的身体、创造性的宇宙和复杂的地方观念。”(斯普瑞特奈克,2001:2)为什么这样说,主要是因为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学通过拒绝生物学机械论,将身体长期从自己的认识论视域中排除出去,从而使个体/社会的认知模式取代了自然/社会的认知模式,正如社会心理学家乔治·米德所说:“我们可以明确地区分自我与身体。身体可以存在并且可能以智能性很强的方式活动,而无需一个包含在经验中的自我。自我有这样一个特征即它是它自身的一个对象,这个特征把它与其他对象和身体区别开来……自我以某种方式进入对自我的经验,而身体则不能在这个意义上经验到整体的自身。”(米德,1992:121页)这样一来,“身体”长期以来受到社会学的冷淡。

人们在谈到认知时,受启蒙理性的深刻影响,往往会诉诸人的意识和理性。直到新近人们得到后现代思想家的提醒,才猛然发现,身体实际上也具有认知性,“身心的确是在认知,因为它创造意义。它对于自己内部和周围大范围的奥妙力量十分敏感,从中自行理解、选择和组织信息。它赋予这信息以意义

^① 生长干部:指由军队自己培养出来的干部,所以一般来说,军事化管理较为严格。

——它自己的意义。它从器官过去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中来创造信息的历史。它会关心自己，也能修复自己。它会兴奋起来，积极地为生存而斗争。每一个身心都是惟一的和不可预知的，每一个都与周围的整体相协调”（斯普瑞特奈克，2001：23）。而且身体的认知甚至是最直接的认知方式，“由于在任何具体时刻，不用指南针就知道自己的左脚放在什么地方，所以身体提供了一种比现在已经饱受责难的启蒙主义理性更亲切、更内在的认知方式”（伊格尔顿，1999：200）。身体不像物体一样，可以脱离“我”的视域之外而存在，身体始终是属“我”的，并与“我”同在，“它始终贴近我，始终为我而存在……它留在我的所有知觉的边缘，它和我的在一起”（梅洛-庞蒂，2001：126）。因此，身体可以更敏感地感觉到周围环境的变化，身体可以更为直觉地感受到行动者自身的变化，这种体认无需诉诸意识便可以获得，同时，意识又可以通过这种直接的体认来获得意义和观念。

个案：“金腰带”的故事（吴广晶等，2002）

那年，我把集训3个月的全部记忆都封存存在了一个厚厚的牛皮信封里，并在信封上郑重其事地写上“减肥运动”4个大字。信封里装的是一条军用腰带，它真实地记录了我从一名地方大学毕业生成长为一名军人的历程。今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信封，腰带上有些黄点，那是当初军训时汗水的“杰作”。我久久地凝视着腰带，记忆又回到那段力与火交织、意志和汗水融汇的时光……那年夏天，我挺着“学者肚”迈进了军营。大腹便便怎么能带兵打仗，年纪轻轻腆着个大肚子哪像个军人？不经过淬火哪能成钢，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武装越野，从2公里，到5公里，10公里；俯卧撑，从30个到60个到100个200个300个单杠，双杠，鞍马，障碍，班战术，连进攻；长途行军、野营拉练……随着训练的进行，随着“学者肚”的缩小，我一次又一次拿起钻子，为腰带钻新眼儿。每钻一个眼儿，每勒紧一次腰带，都意味着我的臂膀在变粗，胸肌在鼓起。就这样，从夏天到秋天，我们整天裹着湿而重的迷彩，演绎着军营“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的风流，甩掉曾经的柔弱，给知识插上坚硬的翅膀，在搏击中我们初露锋芒，形神兼备。

在军营新训的过程中，身体与认知的关系不仅体现在身体的认知能帮助受训人员了解所处的环境和自身情况，而且还体现在通过认知或意义的获得能够对身体的规训产生作用。尼采说过，知道“为何”活着的人几乎能够忍受任何“如何”，弗兰克尔接着尼采的这句话说道，“在这个世界上，我敢讲，能如此有效地帮助人们在最恶劣的逆境中坚持下来的，莫过于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弗兰克尔，1994：80）也许很多经过严格新训的人对此会有深刻的体会。事实上，“当身体被一种新的意义渗透，当身体同化一个新意义的核心时，身体就能理解，习惯就能被获得”（梅洛-庞蒂，2001：194）。

个案：我们军一块去新训的有一个女同学，医学院毕业的。他爸就是军参谋长，现在是副司令。上午搞共同科目训练，教员讲课时，她被黄蜂蜇了一下，但她丝毫没动，脸上肿起了一大块，休息时她哭了，后来才知道她被蜇了，基地给她一个嘉奖，大学生们都很感动，尤其是从她身上我们更是看到了这种军人应有的服从和纪律意识，从那以后我们的服从、纪律意识特别强了。这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个案：就这样，我开始了军训生活，从早上的起床、出操、洗漱、整理内务、打扫卫生、饭前一支歌、军事科目训练……到晚上的点名、熄灯都有严格的时间规定，那么死板。这对我们已经过惯了那种轻松、无拘无束（生活）的地方大学生来说尤其难受。而且我内心深处总感觉像我们今后要从事的是技术工作，军事训练对我们专业技能又不能有所提高，完全是形式主义，因此对军训的抵触情绪比较大。而新训基地举办的一系列的座谈会和报告会，队干部们的热心反复教育，使我逐步明白了反复重复机械简单的队列动作，不仅是在对我们的肉体进行考验，更重要的是要磨练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意志和心灵。只有通过了这个考验，我们才能具备军人所必须的内在素质，树立军人的外在形象。而要求我们在衣着、内务上的高度整齐一致，正是要求我们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牢固地树立令行禁止的纪律观念。只有拥有了铁的纪律，军

队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战斗集体,才能拥有无穷的战斗力。否则,它只能是一盘散沙。

当然,只要是规训就会有不服从的情况,即便是在军营中,“人在任何特定环境中选择自己的态度、选择自己的道路的自由,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弗兰克尔,1994:51)。他可能会在行动流中猛然意识到意义的缺失,从而跳出这种行动流进行一种反思或选择另外一种行动。

个案:“对抗战”(吴广晶等,2002)

初入军营那会儿,总觉得自己是本科生,肯定能胜人一筹,于是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集训时就和排长付云打起了“对抗战”。参加集训已经10多天了,可排长每次叫我,我总是习惯性地回答“嗯”。尽管付排长不只一次地提醒我要答“到”,可我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有时还和他理论:干吗一定要答“到”。付排长说:“这是条令的规定,必须坚决执行,没有理由可讲!”后来,在一次点名时,我依然回答“嗯”,付排长生气了。为让我记住这个“到”字,他把我留下来,连续叫了十几遍我的名字让我回答“到”。此后,这个“到”字倒是记住了,可我心里特别讨厌他……课余时间大家在一块儿聊天时,我有时故意和他抬杠,找他的不是,可每次他都不当回事。有一次,他给我布置工作时,我公开顶撞他,他终于忍无可忍,说帮我请假让我休息两天,好好想想。我说求之不得,休息就休息!看到战友顶着烈日搞训练而自己可以舒舒服服地休息,我心里美得不行。可到了第二天,我就觉得挺无聊的,像只离群的孤雁,有种说不出的难受。于是,我向付排长提出,不想休息了,要参加训练。他说,要训练可以,但得把落下的课补上。尽管我心里不乐意,还是接受了他的条件。从那以后,我像是变了个人似的,在付排长的指导下,我积极努力,认真训练。我的努力没有白费,集训结束考核时,5项内容我拿了3个“优秀”两个“及格”,总成绩名列前茅,还被评为“优秀学员”。付排长的良苦用心,让我顺利地跨出了从地方大学生到合格军人的第一步。

莱辛说过:“有些事情肯定会使人失去理智,除非那人本来就没有理智”(弗兰克尔,1994:15-16)。对于异常情况,会有异常反应,这乃是正常现象。但这并不一定会导致反叛或坚决的离弃,也许只是一种特殊的个体面对特殊处境的反应,“从科学角度上讲,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特性都是取决于处境的一种反应”(波伏娃,1998:8)。或者,这只是一次认知或反思的凸显,而这种凸显会把身体的行动痕迹更清晰地刻印到意识中。而当这种反思与身体的行动痕迹相汇合后,就形成了一种身体的认知,由于这种身体的认知经过个体最真切的身体体验和“刻印”,它就成为最深刻的、“独属于我”的、内在的“阅历”被封存起来,成为伴随人生一直走过的记忆,“通过身体的社会记忆,过去在某种程度上积淀在身体里”(斯特拉桑,1999:43)。因此,许多经过新训的人在经过若干年后都希望再回新训的地方去看看,因为那里凝结着他的汗、他的泪、甚至他的血、他身体的印痕,他曾经用身体与之融为一体,那里的记忆也永远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挥之难去。

个案:难忘那次拉练(吴广晶等,2002)

今年“五一”期间,我背上行囊,踏上南下的列车,来到鄂北的那个小镇,来到我军旅人生泛舟起航的地方。站在曾经流汗流泪的训练场上,坐在曾经闹过笑过的俱乐部里,生命中最难忘的那次经历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两年前,我……来到这个小镇集训。刚开始,我对部队生活充满了好奇,可是随着集训的进行,神秘感消失了,我慢慢发现,直线加方块的生活是那样枯燥,队列训练是那样乏味。拉练的消息,如同一剂强心剂,令我兴奋不已……一个晴朗的周末,我们终于迎着朝霞出发了……然而,一个小时之后,我便没有了说话的心情,开始大口大口喘粗气,好像空气中的氧气不够似的,两条腿机械地向前迈。每次休息时,我连厕所都不想去上。进入山里后,我的两腿隐隐作痛,脚底打起了水泡,汗水透过衣服打湿了背包,鞋垫竟然能拧出水。途中,老区人民的质朴和热情深深感染着我。无论老人还是小孩,都是以亲切、热情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当我们经过一个小学时,学生们拼命挥着小手向我们打招呼,我被这种气氛深深打动了,身上陡增自豪和力

量……拉练结束后,我们开始了强化训练,尽管强度很大,但我没有流过泪,没有掉过队。我想,我已踏上了征程,只要勇敢坚强地走下去,就一定能够达到心中期盼的目标!

个案:我们当时在陆院训练半年,前两个月是新训,后面是军事指挥,开始受不了,当时部队干部的指导思想是完全当新兵,累得躺在床上就睡觉,也没时间想别的,早上晚上跑步,单双杠,对体能还是有好处,效果比较明显。现在看来,培训时间一年最好,一年或18个月,半年还短,还很难培养出来,军人素质还是赶不上,体验也不深,这实际上最终决定对军队的热爱程度。

当这种亲身认知的东西被记忆铭刻在身体上时,这些“准军人”们对其从事的事业便有了一种依恋,因为这是他们的一种宝贵的财富,他们曾经用自己的身体闯出一条成功之路。只要使他们明确这其中的重大意义,身体的训练越是深刻,其记忆越久,历练越深,情感越真。这也是为什么“战友”情是世间最为深切的感情之一,因为他们曾经用生命交换,用身体相依。《美国士兵》一书中有一位曾服役于装甲步兵团的老兵在访谈中说道:“事实上,你连里的所有人都是你的朋友。一个军人学会的事情之一便是同所有人交朋友,并且保持这种友谊。”(Stouffer, et al., 1949:99)

个案:我一生的财富(苏涛,2001)

每一次训练到筋疲力尽的时候只要咬咬牙,再坚持一下,就能挺过去,而挺过去后总会有一种喜悦和收获,有一种胜利感。当第二天再努力坚持、咬牙的时候,发现自己不必将牙床咬得那么紧了,坚持的时间也更长了,忍耐性更强了……我是基地“军训之声”广播站的播音员,同时又是中队的通讯员。每天既要收发全中队的报纸、信件和包裹,又要负责替战友们给《黄龙金秋》和广播站投稿,一周还有4次播音,操课还要尽量不落下,因此课余时间非常紧张。每次播音都错过了吃饭时间,中队值班员或者同班的战友们就轮流替我打饭。一回到宿舍就能吃到热饭,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热乎劲儿。有一次我去大队部取报纸,很晚才回来,心想这下该自己泡方便面了,可刚走到区队宿舍门口时我愣住了,当天的值班员一手拎着一个饭盒站在我面前,冲我微微一笑:“这么晚呀?”“哦”,我诧异地看着他,“怎么,你帮我打饭,自己还没吃啊?”“嘿嘿”,他笑着说:“我打了两样菜和馒头,还有炒饭,我不知道你爱吃哪个就一直等着你”。我不禁鼻子一酸,视线模糊了……谢谢你,我的好战友;谢谢你,我的亲兄弟,谢谢你让我理解了“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感谢军营,感谢黄龙王沟使我真切体会了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互相帮助的战友亲情。

四、身体与时空

身体的存在离不开时空,“身体的空间性……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形成的条件”(Langer, 1989:47)。军营的新兵训练之所以严格,不仅由于身体在体能和技能上要承受磨练,还由于身体在时空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对此,福柯有精辟的论述,他将空间的限制视为一种分配的艺术:“纪律有时需要封闭的空间,规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这是贯彻纪律的保护区”(福柯,1999a:160)。福柯把时间方面的规定指认为对活动的控制,“在奥伦治亲王莫里斯和古斯塔夫二世的新教军队中,军事纪律是通过宗教活动的节奏而确立的”(福柯,1999a:169)。他分析了通过“时间表”对活动进行控制的三个主要方法:“规定节奏、安排活动、调节重复周期”(福柯,1999a:169)。因此,在福柯看来,特定的时间文化与空间文化是一种“纪律”(discipline),是对个体的一种规约和训练,而戈夫曼更进一步将严格的时间文化与空间文化的结合称为“总体性制度”,强调个体在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时空文化规则中的“无可逃逸性”(田佑中,2001)。从策略上看,这是一种规训的技艺,也是军事职业的特性。

个案:我们先是在军里的训练团训练了一个月,后又到陆院去。军里的训练还宽松一点儿,在陆院训练就比较苦。我们军到陆院的一共有14个人,气氛也不一样,去的时候头发还挺长的。到那发现,人家有早到那的,集合动作特别快,男生都是平头。才去干部科接我们吃第

一顿饭时就发现,吃饭都规定时间,很紧张,条条框框也非常多。训练是当年毕业的军校学员训我们。上午搞共同科目,下午教育,晚上组织活动,时间安排很紧凑。

个案(女):女干部专门编一个训练大队训3个月,女生30—40个,女生训练不太苦。训练队列、军体拳、射击、野外作业,中秋节演节目,请军区首长来观看。3个月结束,还搞会操。12月中旬,队列训练苦一些,其他不苦,都不觉得苦,就3个月,也没打退堂鼓。实际上那时真正找到点当兵的感觉,那时感觉最特殊的是出不去,不自由。军区干部部经常派人去看看,我们也都能正确对待,现在还挺回忆那段日子。后来分配到机关,就根本没有典型的军人感觉。

对身体行动的范围和日常作息的时空约束只是身体与时空关系的一个部分,实际上,身体本质上是一个表达的空间,“身体的空间性是身体的存在的展开,身体作为身体实现的方式”(梅洛-庞蒂,2001:197)。因此,在军队新训中更精致的是对身体的一举一动进行严格规定,通过这种对身体每一个部分的严格约束和训练,身体成为角色内化的一条通道,从而使约束得以内化并获得认同。福柯指出:“一种精心计算的强制力慢慢通过人体的各个部位,控制着人体,使之变得柔韧敏捷……新兵逐渐习惯于‘昂首挺胸,收腹垂臂,笔直地站立。为了养成习惯,他们要用这种姿势贴墙站立,脚跟、大腿、腰部和肩部都要触墙,手背也要触墙,当他们伸手时,手不能离开身体甩出来……此外,他们还要学会绝不低眼看地,而要平视他们走路时遇到的人……在没有听到号令以前,(他们)要保持不动,无论头部还是手、脚都不能动……最后,还要学会绷紧膝盖,脚尖向前,列队行进’”(福柯,1999a:153—154)。福柯非常准确地描述了身体在外部空间上的被约束状况,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外部空间上的约束能够更强烈地使身体产生一种情境感知,这才是最内在和本质之处。梅洛-庞蒂在这里又一次超越了福柯,他深刻地指出:“身体的空间性不是如同外部物体的空间性或‘空间感觉’的空间性那样的一种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梅洛-庞蒂,2001:137—138)

个案:我是一个兵(朱斌,2001)

提到当兵的,人们就会想到国庆阅兵时那一队队整齐的方阵,有人说,那是军人尽展风采的时刻。挺拔的身姿、矫健的步伐,是军人最鲜明的形象特征。我们也开始了严格的队列训练,站军姿、走齐步,一举手一投足都要求得近乎苛刻。站军姿,必须保持标准的身形,直挺挺地站上半个小时;走齐步,手形,步速,一切都必须按标准做。常常是一个摆臂,一个跨步硬生生地要支持十几分钟,一个礼拜的队列训练下来,累得浑身筋骨酸痛,但举手投足之中,我感到自己有了军人的姿态……慢慢的,我有了一种“兵”的感觉,直线加方块的队列训练,塑造了我的军人形象,我感到自己的胸挺起来了,步伐显得矫健了许多,整个人都精神了许多……细致严谨的内务训练,使我有更好的养成,也让我明白:成大事者先要做好小事的道理。

实际上,正是通过这种对身体部位及其举动的严格约束,平民生活中作为私密的身体转变为公域的形象,身体的操持权开始逐渐让渡给公域,身体的表达受到公域更加严格的监督与规约。于是,为国献身、爱国奉献便不再是外在于人的修辞,而成为一种身体的本性和追求,从而“身体”实现了从微观个体向社会宏观的跨越。

五、身体与社会

对身体与社会的论述现在已经相当多了,这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女性主义的发展,“性征话题开始于60年代,本来是激进政治向它曾经非常遗憾地忽视了领域拓展的一种行动。但是随着革命活力逐渐消退,对身体的关注起而代之并越来越突出了”(伊格尔顿,1999:199)。西蒙娜·波伏娃的那句名言——“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波伏娃,1998:309)——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我们必须再次重申,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是自然的,和其他许多产品一样,女人也是文明所精心制作的产品。在她的命运中,他人的干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说,如果这种行动采取另外一种方向,就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决定女人的并不是她的荷尔蒙或神秘本能,而是她的身体以及她同世界的关系,通过他

人而不是她自己的行动而得以缓和的方式。把少男少女隔开的那条鸿沟,从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在他们之间蓄意地展开了;后来女人只能是她被造成的那种人”(波伏娃,1998:820)。因此,女人的解放也“只有通过社会演变才可以做到”(波伏娃,1998:820)。

苏姗·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则通过诸多具体的文化案例说明了女性的身体是如何在西方文化的不同时期被不断地“生产”出来(布朗米勒,1998/1984)。同时,与这种观点相伴随的一个更为明显的现象是,几乎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将其关注的核心概念由原来生物学意义上的“Sex”转向了“Gender”(社会性别),“‘社会性别’的定义是:一个社会把人们组织到男性和女性范畴里去的方式,以及围绕这些范畴产生出意义的方式”(金丝伯格、郑,1998/1990)。

现在人们已经公认,性的生理学总是以文化为中介的,关于这一点,福柯说过:“这里的性,并非表示天性,而是作为历史、作为意义和话语的代表。”(福柯,1999b:67)布迪厄也将性别支配指认为“符号暴力”的一种(布迪厄、华康德,1998:225)。当然,马克思也曾精辟地指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自然。”(马克思,1985:76)这实际上为我们明确了身体会受到社会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视为自然的过程。当然,更为人所熟知的是马克思还将人类身体的生产和再生产置于人类社会的开端,并将其指认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涂尔干的思想对身体与社会研究的重要作用也是无法忽视的。他认为,思想的范畴具有社会根源,解释这些范畴应当从它们得以产生的社会状况出发,“范畴应该取决于创建群体和组织群体的方式,取决于群体的形态,取决于它的宗教、道德和经济制度”(涂尔干,1999:17)。他在研究方法上致力于“把心理学领域与社会学领域区分开来”(迪尔凯姆,1995:3),从而有效地防止了心理学还原,形成了社会学整体主义研究的传统。这些主张从内容与方法上都深深地影响了后来对身体进行研究的文化人类学家,如莫斯和玛丽·道格拉斯等人。莫斯发展了身体实践的概念,在他看来,身体是一种生理潜能,只有通过人们所共有的使个体受到规训、约制和社会化的身体实践,这种生理的潜能才能被社会地、集体地实现(Mauss,1979)。而道格拉斯则明确地将身体的生理功能追溯于社会条件,她认为,“社会身体制约着人们感受物质身体的方式”(Douglas,1970:68)。

沿着这条理路往下,我们会发现身体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它成为“文化和自然之间的铰接点,不偏不倚地提供着确定性和精致性”(伊格尔顿,1999:200)。社会与身体的关系首先表现为社会文化对身体的塑造。斯特拉桑指出:“事实上身体被当作编码记忆的源头,文化的基本原则通过被体现而被自然化,它们以帮助记忆的形式被托付给了身体。”(斯特拉桑,1999:37)以入伍大学生为例,当他们从小学、中学那种较为严格的管理生活进入大学不受约束的生活时,他们往往感受到一种身体的解放,他们开始习惯于这种休闲散漫,这是大学文化留在他们身上的记忆。大学毕业进入部队后,他们遭遇到截然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需要他们的身体负载使命与严格的规范,要在他们已经适应了地方大学文化的身体上加上许多早已不习惯的约束,这约束绝对严于以前的中小学习生活,至少在感觉上是这样。所以,每一个军人在新训伊始都要经历一种转变甚至抉择,军事社会学家将此称为“文化休克”,“行动和选择都相对自由是美国民间文化的特色。来自民间的士兵们会感到,贸然闯入军事文化领域是一次会引起内心创伤的经历,这有时被称作‘文化休克’”(Coates & Pellegrin,1965:293)。

个案:从点滴小事谈起(吕益都,2001)

就说军人的一日生活吧,我们就感到有许多不同寻常的地方。比如严格的作息制度,对于我们这些经常熬夜看书晨昏颠倒,闲适松散惯了的“文人知识分子”来说,多少有些难以适应,于是,“打仗”成了我们对这种生活状态的形容;习惯了优美抒情高唱的女孩子们,不明白那动听的军歌,为什么偏偏要“吼”出来;那个被子,明明是为服务的,却为什么反过来,把同志们忙得大汗淋漓;还有练习站军姿,一个枯燥的姿态,为什么要站那么长时间……这里,有许多许多的地方,都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不一样,也都和我们以往的思维认识不一样;这些不一样,使

我们有了 一种“磨合”的感受,这种感受中有累、有疼,有磨擦与碰撞的感觉。

前后两种社会文化如此大相径庭,一种是以自由和怀疑为精神的,一种是以忠诚和服从为标志的。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每一群体都会把对于它来讲最基本的原则和对于它的保留最不可或缺的东西托付给身体的自动机制”(Bourdieu, 1977: 218)。因此,把身体由原来所体现的自由和怀疑本质转变成体现为服从和忠诚的本质就是首要的任务。“正是这些范畴在身体上的体现产生了上述的思想图式,而且因此导致了……构建这种支配关系,也就是说,将其视为自然而然的”(布迪厄、华康德, 1998: 225)。

个案(女):实际上在大学时我们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性格、行为方式,到部队后就感觉到必须压抑自己的个性,在地方上大家都看重的是自由、平等、人格,但到了部队,就讲的是服从。在新训时班长对你根本不尊重,事情做错了,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根本不顾及你的脸面。训我们的班长也是地方大学生入伍的,比我们早来部队一年,对我们还这个样,有时简直就是故意跟我们过不去。后来想,她们这样做也是为我们好。她们也对我们说:“如果不对你们严的话,到部队后人家会笑话你。”当时有些不理解,到部队后,有一次在野外住训,我给卫兵敬了个礼,结果卫兵的手握着枪,也不给我们还礼,我就对旁边的干部说:“你看,好不容易给人家敬个礼,人家还不给还礼,真没面子。”旁边的干部说,“什么呀,人家还礼了,还是举枪礼。”我听了这话,当时觉得真的特别惭愧,自己都当了一年军官了,竟然不知道人家还的是举枪礼。所以说严格些还是对的。

在军队中,身体明显地不再是私密的领地和个体的表征,它强调身体的公开性和集体性,身体的边界不再那么严密和刚性。《美国士兵》一书中也有这样的个案:

和我一个班的战友们是我特殊的朋友。我最好的朋友是班里的一个中士。我们同吃同住,并肩战斗,并一起谈论我们的钱是如何被别针别扣住,放在衬衣口袋里。我们至今仍然相互通信。战争结束后,我们仍希望在一起……如果战士接到一封来信,那么整个班都要互相传阅。属于我的任何东西,同时也属于我们班组。(Stouffer, et al., 1949: 99)

这种对集体性和公开性的强调往往需要通过作用于身体的仪式(通常是面对公众的、集体性的)在社会时空中固定下来。保罗·康纳顿从庆祝仪式的角度发现,身体被当作了庆典建基于其上的重要的记忆场所(斯特拉桑, 1999: 39)。而道格拉斯更是指出:“仪式通过物质身体的象征媒介作用于政治身体”(Douglas, 1984/1966: 128)。军队的仪式往往带有政治和社会意义,而这种仪式使身体的记忆更加清晰。

个案:我们训练那三个月很充实,有个口号叫“留血留汗不留泪,掉皮掉肉不掉队”。这是我们总参训练基地的黄龙精神,我们那时有首歌其中一句歌词我记得很清楚:“博士硕士和学士都来当战士”。那时还有一本新训学员自己办的杂志——《黄龙金秋》,效果比较好,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比较好。训练一个月之后才授衔,这一个月中,有人觉得训练苦,就走了。像我们劈枪方队,有些年纪大的就很苦。授衔仪式是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专程从北京来主持的,他参加我们的授衔仪式并讲话,有些女孩在授衔时都激动得哭了。

以军营新训为例,我们可以发现,要想使人服从并尽心尽力于一项事业,关键在于调动起他的全部身心投入其中,使他的身体与这项事业的要求相契合,与周围的环境及所处社会系统的特性相吻合、相协调,“我们正要去抓住的是这样一种认识:假如真实之深厚的关系本性得到尊敬,那么,身体、自然和地方就将成为智慧和活力的源泉,而不是现代性意识形态所认为的‘限制’”(斯普瑞特奈克, 2001: 4)。从根本上说,“身体”的磨练和规约从来都是自觉的,强制并不是它的充分条件,“明天的人类将是朝气蓬勃的肉体,并且有自己的有意识的自由”(波伏娃, 1998: 826)。实际上,军营新训只是相对更易于理解这一问题的钥匙,或许会开启所有传统社会学理论都难以逾越的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的矛盾之门。

参考文献:

波伏娃, 1998《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

- 布迪厄、华康德, 1998《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 中央编译出版社。
- 布朗米勒, 1998/1984,《女性的人体形象》, 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 三联书店。
- 迪尔凯姆, 1995《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商务印书馆。
- 福柯, 1999a,《规训与惩罚》, 三联书店。
- , 1999b,《性史》, 青海人民出版社。
- 弗兰克尔, 1994《人生的真谛》,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金丝伯格、郑, 1998/1990《不确定的词语概念——美国文化中社会性别的磋商较量》, 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 三联书店。
- 刘江涛、田佑中, 2003《从二元性到二重性: 吉登斯对社会学方法规则的超越》,《河北学刊》第3期。
- 吕益都, 2001,《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从点滴小事谈军人素质养成》,《黄龙金秋》第1期。
- 马克思, 1985《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民出版社。
- 梅洛-庞蒂, 2001,《知觉现象学》, 商务印书馆。
- 米德, 1992《心灵、自我与社会》, 上海译文出版社。
- 斯普瑞特奈克, 2001,《真实之复兴: 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 中央编译出版社。
- 斯特拉桑, 1999《身体思想》, 春风文艺出版社。
- 苏涛, 2001,《黄龙王沟, 我一生的财富》,《黄龙金秋》第1期。
- 特纳, 2000《身体与社会》, 春风文艺出版社。
- 特纳, 2003《Blackwell 社会理论指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田佑中, 2001,《论因特网时代的社会时空》,《南京政治学院学报》第6期。
- 涂尔干, 1999《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维特根斯坦, 1996《哲学研究》, 商务印书馆。
- 吴广晶等, 2002《集训: 我们从这里起航》,《解放军报》9月12日。
- 伊格尔顿, 1999《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朱斌, 2001,《我是一个兵——初涉军营有感》,《黄龙金秋》第1期。
-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ates Charles H. & Roland J. Pellegrin 1965, *Military Sociology: A Study of American Military Institution and Military Life*, Maryland: The Social Science Press.
- Douglas, M. 1970, *Natural Symbols: 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Random House).
- , 1984/1966,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ARK Paperbacks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Giddens Anthony 1993,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Lange, Monika M. 1989, *Merleau-Ponty's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A Guide and Commentary*, Tallahasse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Mauss M. 1979,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Essay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Stouffer, Samuel A. et al. 1949, *The American Soldier*, Vol. I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系讲师
责任编辑: 罗琳